

# Globethics Repository



## 歷史語言學方法在聖經闡釋中的運用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               |                                                                                                   |
|---------------|---------------------------------------------------------------------------------------------------|
| Item Type     | Article                                                                                           |
| Authors       | Chen, Yiyi                                                                                        |
| Publisher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 Rights        |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
| Download date | 2026-07-16 14:15:40                                                                               |
| Link to Item  |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08">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08</a> |

# 历史语言学方法在圣经阐释中的运用\*

陈 贻 绎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详细介绍了历史语言学方法在希伯来语圣经研究中的运用,展示出该方法的若干方面,包括其研究历史、框架、现状及成果。继而通过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几个典型例子,来说明该研究方法的一些特色。文章着重就《创世记》24章中的阿拉米语语言现象进行了分析,试图揭示出历史语言学是如何利用多方面数据来断定该章可能的写作背景和相对的写作时间的。文章最后列举了历史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一些局限性。

**关键词:**希伯来语圣经;方法论;《创世记》24章;历史语言学;阿拉米语

---

\* 本文据笔者2006年12月在北京大学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主办的“《创世记》学术研讨会”上发言的一部分增改而成。

## Historical Linguistics Method in Biblical Studies

Yiyi Ch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method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deeper into one methodology and discusses its various aspects. The article covers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n the field of Biblical Studies, its research framework, its current status, achievements and significance. Examples touch upon phonology, vocabulary, and morphology. The main effort is to illustrate two scholars'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using the prominent Aramaism found in Genesis 24 to determine the composition date of the chapter. Emphasis is on the various aspects one need to consider when judging whether the Aramaism is simply due to the late composition time of the piece or due to the literary need of the composer. Besides Aramaism, other criteria such as concentration of Standard Biblical Hebrew features vs. Late Biblical Hebrew features in the passage are very important to make a final conclusion. The last part of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chool.

**Key words:** Hebrew Bible; Methodology; Genesis 24; Historical Linguistic; Aramaic

本文试图将语言学研究(linguistics)的一个下属分支——历

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之研究方法运用于圣经学术领域的历史和贡献进行简要的举例说明。中国学术界对此研究方法的了解十分有限,国际学术界用该方法对圣经文本进行研究的学者亦为数不多;这使得此项介绍很有必要。本文不仅希望能够通过对所举例子的阐释来展示这个学科深入发展的现状,而且想指出此方法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和短期很难解决的问题。

## 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框架

我们首先看一看学者们是如何界定历史语言学的。1927年,萨迦尔(M.H.Segal)的《米西拿希伯来语语法》(*A Grammar of Mishnaic Hebrew*)最早开始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米西拿希伯来语的历史进行讨论。他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米西拿希伯来语和圣经希伯来语之间的关系并非如一些学者所假定,是一脉相承,变化不大的;圣经希伯来语和米西拿希伯来语是同一种语言——古希伯来语——的两个很不相同的阶段。这两个阶段不仅在时间上相差若干世纪,在地理位置上也相差甚多。它们在发音、词汇、词法、句法、表达方式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例如,在希伯来语圣经中的1350个动词词根中,有250个在米西拿希伯来语中不再出现;而米西拿希伯来语另外增加了300个新的动词词根;即使是米西拿希伯来语中保留了的圣经希伯来语词汇,由于受阿拉米语的影响,有的含义已经改变;有的米西拿新词汇则直接转借于阿拉米语。米西拿希伯来语的整体词汇更加丰富,和圣经希伯来语的差距是相当大的。<sup>①</sup>

以萨迦尔为开创者的区分古希伯来语不同时期的努力自此

---

① M. H. Segal, *A Grammar of Mishnaic Hebre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1958年勘误和增加附录后再版。

从未间断。论及对历史上所有的希伯来语的分期,除了现代在以色列使用的活的希伯来语外,还有犹太启蒙运动时期的哈斯卡拉(Haskalah)希伯来语、中世纪希伯来语、米西拿希伯来语和圣经希伯来语(有的学者认为最后两个阶段之间还可以加入死海古卷希伯来语)。真正对圣经希伯来语进行的细致分期是建立在许多相关学科发展的基础上的。例如,1930年之后出土的乌加里特语(Ugaritic)的破译和研究,古阿拉米语各种方言的研究,阿卡德语,尤其是埃及阿玛儿那(Tel Amarna)出土的阿卡德方言的研究,以及新近在巴勒斯坦地区考古发掘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古阿拉米、古希伯来语和该地区其他语言的研究,对圣经希伯来语进一步的分期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圣经研究这门学科中仅有为数不是很多的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专著。<sup>①</sup>

现代语言学将语言的特征分为语音、词汇、词法和句法。随着语言的发展,一种语言在这几个方面或某一方面会有些许的变化。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汉语这几十年的情况。同样是政府倡导的标准口语,大陆叫“普通话”,台湾地区叫“国语”。在语音语调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从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后的不到60年里,普通话和国语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而现代,随着大陆和台湾地区经济交往的加深,有些特征又开始了融合。这说明政治的变化会导致语言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以人和政府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许多差异以及后来差异的相互融合并非政府导致,而是语言自然

① 例如: Jacob Milgrom, *Studies in Levitical Terminology 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Avi Hurvitz, *The Transition Period in Biblical Hebrew: A Study in Post Exilic Hebrew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Dating of Psalms* (in Hebrew, Jerusalem: Bialik Institute, 1972); Robert Polzin, *Late Biblical Hebrew: Toward an Historical Typology of Biblical Hebrew Prose* (Missoula: Scholars Press, 1976); 更多的书目请参考 Ziony Zevit, "Introductory Remark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the Dating of Hebrew Texts ca. 1000-300 B.C.E.," *Hebrew Studies* 46 (2005): 323。

发展的活力所致。)这种语言发展的规律对于圣经希伯来语同样适用。另外,词汇是追踪语言变化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我们仍以大陆和台湾地区为例。截止20世纪70年代末,因为未同英语国家进行广泛交往,大陆普通话中的英文外来语几乎冻结在40年代末的水平上;而同时期的台湾地区由于和美国关系密切,其国语中融入了大量的英语外来语词汇。同样的道理,活跃在众多使用其他语言的大国中间的相对弱小的以色列民族的语言——古希伯来语,受到外来语的影响程度也必然很高。对这种影响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帮助学者们判断出圣经希伯来语语言发展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程度,从而进一步判定古希伯来语相应的发展阶段。

上面我们结合中文的例子,从直观角度说明了圣经希伯来语学者所面对的研究任务是有很好的切入点的。汉语学者如欲系统地对比和总结出普通话和国语的差别,就需要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数据采集和分析工作。如果汉语学者将研究出来的结论当作标尺,并以之来判断一篇文章到底是何时何地由谁写成的,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挑战。上述两个层面的挑战也是希伯来语圣经学者所要面临的。而且,圣经研究者还有一个额外的困难——圣经希伯来语是已经死亡的语言,可供分析的数据基本上只能来自希伯来语圣经的有限文本。<sup>①</sup>

我们回到希伯来语圣经学者的工作。学者们会将圣经希伯来语的发音(由于古希伯来语是已经死亡的语言,它在这方面的变化是比较难以衡量的,但是我们会在下面的例子中看到,某些方面还是可以考证出来的)、词汇、词法、句法、表达方式等方面进行细致的分类,然后和不同时期的周边语言进行比较,进而确定圣经希伯来语相关特征的相对年代。一旦某些语言特征的绝对年代得以确定,其他相对于这些特征的语言特征的绝对年代也就随之

---

<sup>①</sup> 关于此点,本文的最后一节还会专门讨论。

确定。这样,一组组语言特征也就被划入了圣经希伯来语的不同历史时期了。(这个过程十分繁琐,其间也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这点后文有更加详细的举例说明。)

那么,语言学家是如何为古希伯来语进行分期的呢?在1980年代,以色列、美国和一部分欧洲学者对希伯来语圣经中使用的希伯来语的相对年代基本上达成了以下几点共识:

1、《民数记》23—24,《出埃及记》15,《底波拉之歌》(士5),这些诗歌在语言上和标准的希伯来语圣经中的诗歌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根据历史语言学的比较方法,基本可以将它们定位在公元前10世纪之前;学者们将这些诗歌的语言称为“早期圣经希伯来语”。

2、希伯来语圣经的大部分作品写作于公元前9—前6世纪,使用的语言被学者们称为“标准圣经希伯来语”。

3、更晚的作品(《历代志》、《以斯拉—尼希米记》、《传道书》和《以斯帖记》)使用的是“晚期圣经希伯来语”。

4、以上三个时期的圣经希伯来语获得了同时期的考古发现得到的文字证据的证实。

5、希伯来语圣经中会有一些不符合学者们的分类的证据出现,如“早期圣经希伯来语”的语言特征出现在应该是“晚期圣经希伯来语”或者“标准圣经希伯来语”写成的作品中,或者反之;这些例子又被一些学者从另外两个角度进行梳理和解释:

1)圣经希伯来语中存在不同的方言,如北方的以色列方言和南方中央政府的犹大方言;由于有些北方方言的语言特征和不同时期的圣经希伯来语的语言特征相似或者重合,出现上述矛盾可能是缘于相关文本由方言写成,或者相关说话人来自方言区,操不同于文本写作语境的方言;

2)希伯来语圣经的作者是文学创作的巨匠,出于文学效果的考虑,有时候会故意使用方言或者外语来润色文字,有时候是为

了压头韵(辅音韵),有时候是出于使用双关语等文学修辞的需要,这些导致了个别独特的希伯来语用法,如一些怪僻词汇和一些外来语词汇的使用。这些用法一旦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应该被视为特例,不应被视为对文本进行写作时期定位的障碍。

在晚期圣经希伯来语时期,主要受到的外来语影响是早些时期的阿拉米语和更后来(其后来的?)的波斯语。在阿拉米语和波斯语的影响方面,问题并非黑白分明;也就是说,有阿拉米语或波斯语影响的希伯来语并非毫无疑问地一定是晚期的圣经希伯来语。最早对此问题进行讨论的是赛鲁斯·戈顿(Cyrus Gordon)。<sup>①</sup>在这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证,并出版专著专家是阿维·赫维茨(Avi Hurvitz)。<sup>②</sup>例如,在一段圣经中看到阿拉米语的影响后,断定这篇文章是否为晚期作品还取决于另外几个因素。第一个是看这些外来语因素是否有其他的解释:这些阿拉米语的影响是完全出于写作时期的语言原因?还是有其他的文学技巧、方言等方面的原因?第二个是这类现象的集中程度:在这段经文中,是否还有比较集中的其他的晚期希伯来语的语言成分?如果这段文字中有比较集中的标准希伯来语语言成分,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其中的阿拉米语影响并非简单的成书年代晚的原因。第三个因素是纯粹的统计学上的概率问题:这些阿拉米语的影响是个别现象呢,还是有一定的集中度呢?只有一两处阿拉米语词汇是无法证明一篇文字成书年代的早晚的。

上面简单介绍了历史语言学的历史和研究框架,下面来看几个具体的个案。

---

① Cyrus Gordon, "North Israelite Influence on Post-Exilic Hebrew," *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 5 (1955): 85-88.

② Avi Hurvitz, *A Linguistic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estly Source and the Book of Ezekiel* (Paris: J. Gabalda, 1982).

## 几个例子

学者们是如何知道方言在希伯来语圣经时代的希伯来语中之存在的呢？我们先从发音角度来看一个希伯来语圣经中记载的有关方言的例子。在《士师记》中，作者保留了一些关于部族之间争斗的记载，为我们了解部族之间的语言差异提供了些许线索。在耶弗他和以法莲之间发生的战斗以耶弗他的胜利而告终。《士师记》第12章5—6节记载了那次战斗中一个有趣的细节，中文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回答的人如果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示播列(שבֹּלַת)’；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便说‘西播列(סבֹּלַת)’；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四万二千人。”这个小插曲为语言学家研究古希伯来语中的不同方言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首先，经学者考察发现，耶弗他人的方言中有一个和亚扪人（Ammonite）的语言相同的词语，叫 *thibbolet*，意思是“水流，激流”。这个词语的意思在当时的语境中十分适合——耶弗他的士兵在约旦河边，为了试探来者的真实身份，自然是根据所处的环境急中生智想出“水流”这个词语来试探来者。这个词语中的第一个音是 *th*——就像英文 *three* 中 *th* 的发音（国际音标是 [θ]）。因为标准圣经希伯来语的字母体系中没有表示这个辅音的字母，所以在希伯来语圣经中记载的拼写是 *shibbolet* (שבֹּלַת)，将 [θ] 音用 [ʃ] 音代替了。以法莲的方言中无疑是没有这个辅音的，这一点当时耶弗他的士兵是肯定知道的，否则就不会用这个词语来试探了。所以以法莲人在模仿这个发音时使用 *s* 音来替代 *th* 音，将这个读成了 *sibbolet* (סבֹּלַת)，希伯来语圣经忠实地记载下了这个发音。如此看来，以法莲人并不是如和

合本所翻译的因为“咬字不真”而丧失了性命,而是因为根本就不会发[θ]这个音,或许忠实于希伯来语原文的翻译应是“不能够发这个词的音(ולא יכין לרבר כן)”。<sup>①</sup>这个例子能让我们对学者是如何通过与周边语言的对比来寻找圣经希伯来语中的方言的方法体会一二。对圣经希伯来语中方言的存在和认识有助于学者进一步深入了解圣经文本的确切意思。

上文中我们讲到,在一段希伯来语圣经文本中出现阿拉米语,有的时候可能是作者出于文学表达的需要。我们来看一个有关词汇的例子。在《创世记》21:7中,作者表达“说”这个意思时,用的是阿拉米语的标准词汇מלל,<sup>②</sup>而不是标准希伯来语的אמר。<sup>③</sup>这是在希伯来语散文体作品中唯一一次使用מלל这个动词词根。我们如何解释这一奇怪现象呢?是不是应该根据这个词汇的出现而断定这一章写成于阿拉米语对希伯来语影响严重的波斯时期呢?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除了没有其他方面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个假设外,מלל的出现可以用希伯来语圣经文学的押辅音韵(alliteration)的技巧来解释:在第7节的מלל出现之前,我们读到了第4节的מול(行割礼)这个动词,之后在第8节中又两次读到了גמל(断奶)这个动词。<sup>④</sup>希伯来语圣经的作者出于押辅音韵的文学效

① 具体的论证细节请参考G. A. Rendsburg, "The Ammonite Phoneme / T /,"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69 (1988):73-79; "More on Hebrew šibboleṯ," *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 33(1986):255-258。

② 这个词根的用法早在拉希(Rashi, *Ber. R.* 53.9)时就被注意到了;只是他使用了Gematria(犹太神秘主义的一个分支,将所有希伯来语字母赋予数字值,并通过这些数字的变化来进行神秘主义的圣经和宗教解释)的解释——מלל正好是100,而那时亚伯拉罕的年纪也是100岁。

③ 其实,这个标准希伯来语词根在同一节的开篇就被使用;这更加说明后面的阿拉米语用法并非作者的习惯性语言,而是文学技巧。

④ Gary A. Rendsburg, "Hurvitz Redux: On the Continued Scholarly Inattention to a Simple Principle of Hebrew Philology," in I. Young, ed., *Biblical Hebrew: Studies in Chronology and Typology* (London: T & T Clark, 2003), 104-128, especially 107.

果的考虑,选取了这个阿拉米语的动词,来替代一个无法达到这一效果的希伯来语动词。如果我们考虑到《创世记》这样的作品在某个阶段很可能是被口头传诵的,这种对押辅音韵的追求就不难理解了——除了声音上的美学效果,这种韵脚无疑对帮助记忆也贡献很大。希伯来语圣经忠实地记载下了口头文学作品中的这一用法,从而使作者运用的文学技巧和智慧得以保存。

再来看一个习惯用语的例子。在标准圣经希伯来语中,臣子见了国王(或者平民见了神或者天使)进行的跪拜一般用 **אַרְצָה אִפִּים יִשְׁתַּחוּ** 这个词组,意思是“将自己的脸朝向地面趴倒(俯倒)”。这个拜见国王的礼节在希伯来语圣经中出现了27次,一直到一些晚期的作品,如《尼希米记》和《历代志上》等处,这个习惯用法都得以保持。但是在整部希伯来语圣经中却有一次,在《历代志下》的第7章第3节,在 **אַרְצָה** 之后作者又加上了 **עַל-הָרֶצֶפָה** (在地面上) 这个补充短语。**עַל-הָרֶצֶפָה** 这个词语是受波斯语影响而产生的晚期希伯来语词汇。一般来讲,像这样一个记载拜见国王之礼节的约定俗成的习惯性短语,是比较难以受外来语言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这在希伯来语圣经中也的确如此,如在《尼希米记》和《历代志上》的两次出现,当时已经有了波斯语的影响了,**עַל-הָרֶצֶפָה** 这个词汇并没有出现在这个短语中。但是,当希伯来语圣经的作者有足够多的机会来写下他们当时的语言时,外来语言的影响就难免在一些地方显现出来——这被《历代志下》的第7章第3节忠实地记载了下来。<sup>①</sup>

除了上面的例子提到的一些作用外,历史语言学试图回答的

① Avi Hurvitz,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Biblical Hebrew: The Linguistic History of a Formulaic Idiom from the Realm of the Royal Court," in *Biblical Hebrew in its Northwest Semitic Setting: Ty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ed. Fassberg, Steven E. and Avi Hurvitz (Jerusalem: Magnes and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2006), 127-134.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希伯来语圣经中的某些作品是何时写成的。我们知道,学者们是可以根据其内容和人物,以及其中记载的相关历史事件来确定作品的写作年代的。这个方法对于一些晚期成书的圣经作品比较适用。例如,通过对《以斯帖记》中内容的分析,人们完全可以将其与波斯王朝的历史相互对应而推断出创作年代。但是对于希伯来语圣经中比较早期的作品,如习惯上被称为摩西五经的希伯来语圣经的前五部书,上述方法就恐怕难以奏效了,其中原因是大部分作品中记载的内容被学者在文体性质上定义为神话传说。但是从历史学上讲,即使是神话传说,也有何时被记载成文字的区别;也就是说,即使是《创世记》这样的作品,也应该有一个特定的成文时间。对于如何推导出这个时间,许多圣经研究的相关学科都作出了不同的努力,虽然并没有哪一派学者的论点得到各方的全面认同。<sup>①</sup>考古学对这个问题也无能为力——一个方面是由于《创世记》中的许多情节和事件被认为是神话传说,没有可以进行考证的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无法对这些事件提供考古上的佐证,这些事件发生的确切年代的证明便根本无从谈起。另外,即使《创世记》中记载的有些事件的确切年代可以被证实,这些事件是何时被作者记载下来(哪怕先是口头,之后才落实到文字)也仍然无法确定。考古学的一个成果——死海古卷的写作年代——倒是一直被认为可以提供《创世记》成书之可

---

① 对于《创世记》的成书和写作日期,在学界是一个争论颇大的话题。有的阵营根据希伯来语圣经文本本身字面的记载,将写作时期定在摩西时期(公元前15世纪之前)。主流学者们将这部书的主体成书定在统一王朝时期(约公元前10世纪),参考Gary Rendsburg, *The redaction of Genesis*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1986), 以及其他众多的专著论述。最晚的目前定在希腊统治时期,最有代表的作品是Russell E. Gmirkin, *Berosus and Genesis, Manetho and Exodus: Hellenistic Histories and the Date of the Pentateuch* (New York: T&T Clark, 2006), 以及其中列出的其他众多北欧学派的作品。Gmirkin认为包括《创世记》在内的摩西五经写成于公元前273—272年。

能的最晚时间(*terminus ad quem*)——公元前2—前1世纪左右。<sup>①</sup>历史语言学家对希伯来语圣经中作品的创作时间的定位采取的是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其核心原则是上文讨论过的根据圣经希伯来语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不同语言特征来断定一部作品的相对写作时间。

上文提到,如果阿拉米语的影响出现在某段希伯来语圣经文本中的话,这段文本中的圣经希伯来语就有使用得比较晚的可能性。但是这些语言因素的出现,还不能简单地成为断定这段文本成书年代的唯一标准。对这些数据的质和量以及集中程度的进一步把握,是得出最终结论之前必须进行的工作。

我们来看一个用历史语言学方法来判断《创世记》24章的写作时期的例子。这一章故事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都是阿拉米。对这章的写作时期从历史语言学角度进行过论述的只有亚历山大·罗菲(Alexander Rofé)和加里·伦兹博格(Gary Rendsburg)两位学者。<sup>②</sup>罗菲列举了八个阿拉米语特征出现在这一章中的十几处文字中(见下表),认为这些阿拉米语特征的集中出现从历史语言学上可以证明该章成书于波斯时期。<sup>③</sup>而伦兹博格则根据上文中

① 但是从死海古卷出土以来,一直有少数学者认为整个死海古卷是中世纪的作品(参考Solomon Zeitlin, *The Dead Sea Scrolls and Modern Scholarship*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Monograph Series*, no. 3, Philadelphia: Dropsie College for Hebrew and Cognate Learning, 1956))。如果这个学说成立,那么死海古卷就和《创世记》成书最晚年代的研究没有什么关系了。本文跟随主流学者对死海古卷写作时间的确认。

② Alexander Rofé, "An Enquiry into the Betrothal of Rebekah," in *Die Hebräische Bibel und ihre zweifache Nachgeschichte: Festschrift für Rolf Rendtorff zum 65 Geburtstag*, ed. E. Blum, C. Macholz, and E. W. Stegemann (Neukirchen: Neukirchener Verlag, 1990): 27-39; Gary A. Rendsburg, "Some False Lead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Late Biblical Hebrew Texts: The Cases of Genesis 24 and 1 Samuel 2:27-36," in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21 (2002): 23-46.

③ Rofé 1990;除了语言学的因素,他还列举了法律背景、宗教法规、文学形式和故事中心思想另外四方面的证据;本文只就历史语言学的论据进行讨论。

提到的赫维茨的控制原则,将此章中每次阿拉米语特征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进而得出单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是无法断定此章属于波斯时期作品的结论的。

下表列出了《创世记》24章中所涉及的8处主要的被罗菲认定为阿拉米语借用的特征,并简要解释了这些特征的特殊性。由于篇幅的关系,在此不赘述论证的细节,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伦兹博格的文章。

《创世记》24章中的特殊希伯来语用法

| 节   | 语言特征         | 特殊性                                                                    | 其他出处                                                        |
|-----|--------------|------------------------------------------------------------------------|-------------------------------------------------------------|
| 3,7 | אלהי השמים   | 来自阿拉米语的<br>אלהא רשמיא ;                                                | 《约拿书》1:9;《以斯拉记》1:2;《尼希米记》;《历代志下》;《以斯拉记》和《但以理书》的阿拉米语部分(阿拉米语) |
| 3   | אשר (לא-תקח  | SBH 应该是:תקח, אא外来用法<br>(calque)                                        | Targum 翻译《创世记》21:23;《撒母耳记上》24:21                            |
| 17  | נמא/ הנמיאני | 饮(使动词,入声),<br>给水喝                                                      | 《约伯记》39:24;Targums,<br>נמע/נמי/נמא                          |
| 20  | ערה          | 倒(液体),希伯来语<br>圣经中只出现在此<br>一次;典型的MH,阿<br>拉米语用法                          | Targums多处                                                   |
| 21  | שאה/ משתאה   | 凝视,看;希伯来语<br>圣经中只出现在此<br>一次;MHשה,阿<br>拉米语用法;同时-ת<br>前缀和שה/ שאכ<br>押辅音韵 |                                                             |
| 38  | אם-לא        | “而是”,SBH אם כי, מלא<br>MHלא<中期阿拉<br>米语 לא < אן לא <<br>阿拉米语 לא הן      | 《诗篇》131:2                                                   |

|                                       |        |                                                                      |                                                                                                      |
|---------------------------------------|--------|----------------------------------------------------------------------|------------------------------------------------------------------------------------------------------|
| 53                                    | מנדנות | “精选的礼品”, מנדן<br>“精选的果品”;希伯<br>来语北方方言;阿拉<br>米语                       | 《以斯拉记》,《历代志》; מנדן<br>《申命记》33,5次,《雅歌》3<br>次;Targum                                                   |
| 14-<br>18,<br>20,<br>43,<br>45,<br>46 | כר     | “罐子”,希伯来语北<br>方方言;也在多种阿<br>拉米语方言中使用<br>(此点罗菲并没有注<br>意到,而由伦兹博格<br>提出) | 《士师记》7:16,19,20, 基甸<br>的故事;《列王记上》, 以利<br>亚的故事;《传道书》12:6;<br>MH, 乌加里特(Ugaritic), 腓<br>尼基语(Phoenician) |

\* ✓代表词根;<代表从右到左的演化方向;SBH=标准圣经希伯来语;  
MH=米西拿希伯来语;Targums=希伯来语圣经的几种阿拉米语翻译, 包括  
Targum Onqelos和Targum Jonathan (这是Targum的两个不同时期和地区的不同  
的版本)。

上面表格中的所有阿拉米语语言特征在《创世记》24章中的出现,被伦兹博格逐一进行了研究和解释。最后的结论是,由于这段故事的背景发生在阿拉米语地区,作者希望读者(听众)对故事有一种身历其境的感觉,故使用了大量带有阿拉米语语言特征的希伯来语,包括词汇、语法、句法和习惯用语。这些语言特征不仅用在了第三人称的陈述中,也用在了第一人称的论说中。由于这些阿拉米语言特征的运用,当时听众的耳朵是不会错过这段故事浓重的阿拉米背景的。

尽管上表中罗列出大量的受阿拉米语语言特征影响的希伯来语,但这并没有抹煞掉这段故事使用标准圣经希伯来语写成的事实。下面我们列出7条在这章中出现的标准圣经希伯来语的语言特征。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这章中标准圣经希伯来语特征的一部分而已,并非全部。<sup>①</sup>

① Rendsburg 2002,33;Richard M. Wright, "Linguistic Evidence for the Pre-Exilic Date of the Yahwist Source of the Pentateuch," Ph. 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8.

1、标准的waw连贯动词用法出现在39,42,45,47,48(三次)节中;而晚期圣经希伯来语惯用的加长型的waw连贯动词用法一次都没有出现;

2、在第30节,跟随—כ的动词不定式结构(infinitive construct)前使用ויהי是典型的标准圣经希伯来语用法;在晚期圣经希伯来语中不出现ויהי;

3、第6节中使用的פן(以防,唯恐)是典型的标准圣经希伯来语用法;晚期圣经希伯来语中的对应用法是למען לא;

4、第27节使用了标准圣经希伯来语的用法:ברוך יהוה(神是应被称颂的),而晚期圣经希伯来语的用法是ברוך אתה יהוה或者ברוך שם יהוה;

5、第37、38、40、48、67节中使用的表示“娶妻”的词语是标准圣经希伯来语的לקח אשה,而晚期圣经希伯来语的用法是נשא אשה;

6、第18节中使用的表示“赶快”的词语是标准圣经希伯来语的מהר,而晚期圣经希伯来语的用法是בהל;

7、第22、51、61、65节中使用的表示“拿”的词语是标准圣经希伯来语的לקח,而晚期圣经希伯来语的用法是קבל。

上面的例子说明了标准圣经希伯来语在《创世记》24章中的普遍出现。这些标准圣经希伯来语都有它们相对应的晚期圣经希伯来语的形式。这些形式并没有在《创世记》第24章被使用。这进一步证明了本章应该是相对早期的而非波斯时期的作品。否则,一些晚期圣经希伯来语的形式也应该出现在文本中,而不仅仅是一些阿拉米语的借用形式。能够支持上述结论的论据并不止于此。下面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角度的论据。

以色列学者鲍拉克(Polak)借助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和语言学分析软件,通过分析希伯来语圣经中散文文体之语言发展的一些特色来判定作品某一部分成书的早晚。例如,一段文字中的名词

和动词的比率(NV),动词的名词形式(nominal form)和动词形式(finite form)的比率(NF),以及一些常用动词的早期和晚期的对比形式的使用频率等,都能够为确定一部书写成的时期提供语言学的线索。根据鲍拉克的研究结果,波斯时期希伯来语圣经作品的NV和NF都比标准圣经希伯来语时期高。例如,《以斯拉记》的NV是0.772,而《士师记》中的参孙故事只有0.581。《以斯拉记》的NF是0.383,而雅各故事只有0.119。在早期希伯来语圣经中,有些动词要比晚期时使用得频繁(如 $\text{לקח}$   $\text{הלך}$ );而在晚期作品中,这些早期动词所表达的意思有了晚期的对应形式(和上面三个动词相对应的形式分别是 $\text{שמע}$   $\text{הביא}$   $\text{בוא}$ ,注意这里第三个动词从“看”转变成了另外一个动词“听”),而且这些晚期的形式在早期希伯来语中使用得要远不如晚期那么频繁。<sup>①</sup>伦兹博格就上述三个方面对《创世记》第24章进行了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在NF比率、NV比率,还是在常用动词的分布比率上,《创世记》24章都和其他的标准圣经希伯来语作品相似,完全符合此时期作品的标准比率;而其和晚期希伯来语圣经作品相比较,这三个指标都相差甚远。<sup>②</sup>

上面针对《创世记》24章成书时间判定的讨论涉及了三个方面的证据。第一方面是根据圣经希伯来语的方言学和文学技巧研究,总结出在本章中出现的阿拉米语词汇和语法形式是文学写作的需要,而并非是因为成书时间很晚且受到了同时代的阿拉米语的影响;第二方面说明标准圣经希伯来语的语言特征在本章中集中出现,而本章中除了阿拉米语影响的8处用法外,并未发现其他晚期圣经希伯来语的语言特征;第三方面则通过对作者主观上很

① F. Polak, "The Oral and the written: Syntax, Stylis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iblical Prose Narrative," *Journal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ern Society* 26 (1998): 59-105.

② 具体数据和比较性表格请参考Rendsburg, 2002, 第34页。

难控制的动词和名词使用比率、动词词根的动词形式和名词形式的使用比率,以及常用动词的出现比率等微妙的语言统计学数据,来证明本章和《创世记》的其他章节,以及更多的标准圣经希伯来语作品其实出于同一时期,而非更晚的时期。

那么,通过这一系列论证,得出的结论是否就一定正确呢?这一点可能还要经过此学科的不断发展,从而获得更多的证据去证明。如果有学者指出这个结论不正确,就需要对上面列举的各种方法进行逐一反驳。断定一个希伯来语圣经片段的写作时期早晚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尤其是当我们研究的文本属于神话和传说范畴,并不与可考的历史事件相对应时。问题的解决需要方法的探究。为了独立客观地判定一段文本的写作年代,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各种能够进行客观分析并作出判断的具体方法,并辨析出这些方法的优劣短长。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具备别的研究手段所不具备的长处,本文列举的例子并非为了就某个问题进行详尽的论证,而是希望让读者知道这种研究方法,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文献资料。

## 历史语言学研究在圣经研究中的现状和局限性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历史语言学在圣经研究中的某些领域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优势。但是,作为在这一分支耕耘过多年的学者,笔者也希望借助此文第一次用文字指出该学科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局限性。

一、这一学科的学者人数很少且主要在北美、欧洲和以色列的大学从事科研和教学。人数稀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能够真正进入这一分支的科研需要经历一个漫长和艰苦的训练过程。除了方法论的训练,还必须对古代近东与以色列相关的语言进行比较深入的学习。这些语言包括各个阶段的古希伯来语、埃及象形文字、

苏美尔语、阿卡德语、乌加里特语、阿拉米语的各种相关方言,以及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期间的西北闪米特语族的其他语言(如腓尼基语、摩押语等)。同时,由于该分支学者的学术著作、论文集中发表在英语、现代希伯来语、德语和法语期刊上,对这些现代语言的熟练掌握也是科研开始的必须。由于以上这些要素,真正在这个学科中进行研究工作的学者可以说寥寥无几。学者的稀少造成了一个必然的问题,就是其学术成果缺乏必要的同行监督以及挑战。

二、上述原因还造成最近几十年来一个客观事实,就是进行此方法研究的学者多为以色列人或者以色列国以外的犹太人。这些学者本身的母语往往已经有两到三种(希伯来语、英语,有时加德语),在此基础上他们有足够的精力学习其他语言。这个事实实际上造成了海外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在此学科中的垄断地位。我们都知道,垄断对于任何事情的健康发展都没有好处。加之被研究的对象又是垄断者的文化和宗教经典,致使这些学者的学术结论往往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批评。

三、上述第二点在学科发展中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即导致非以色列和犹太学者出于各种可想而知的原因不得不渐渐退出这个阵营。这样,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批评和监督也渐渐丧失了。

四、不在这个阵营中的学者即使与此阵营中学者的研究意见相左,由于自己并没有接受相同或者类似的训练,也就无力提出有力的和系统的反驳意见。而此阵营中的学者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对他人的批评不予理睬。久而久之,阵营中和阵营外的隔阂会越来越大,渐渐形成对圣经研究的同一个问题,运用不同方法的阵营花开几朵而各表各枝的局面。

五、历史语言学除了面临上述问题外,还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

(一)由于学者的研究对象是一本字数有限、语法现象数量也

有限的僵死固定的希伯来语圣经,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一个理论的数据往往都显得有质无量,如果对许多研究成果仔细推敲,从统计学(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的原则上讲,其结论都难免显得牵强。<sup>①</sup>

(二)希伯来语圣经文本以外的文字材料(包括希伯来语和其他语言,以及与圣经写作同时期的考古出土的文字资料)寥寥无几。所有这类资料加到一起还不及希伯来语圣经数量的1%。这在统计学上也很难符合对数据统计量上的要求;用这些资料对希伯来语圣经文本的语言学研究无论证实还是证伪,都难免欠缺说服力。

(三)字母语言乌加里特语的出现比最早的希伯来语圣经作品要早至少200多年,其使用地区距离古以色列的文化中心也有几百公里;虽然乌加里特语对希伯来语圣经语言的研究贡献很大,但是许多学者对它们的研究出于两者之间时间和空间的差异而态度十分谨慎。

(四)对许多晚期古希伯来语的资料(如死海古卷、米西拿希伯来语等)和标准圣经希伯来语进行参照性研究时,除了时间上的跨度大外,还有地理位置的差异;而且,这些语言在受到阿拉米语影响程度、口语化程度等方面本身就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 小 结

人的交流需要语言,无论是文字语言还是日常语言,家常生活的语言还是阳春白雪的语言。这些语言对于一个人来讲是其后

---

①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10个里面有1个特例,特例率是10%,其说服力远不如10000个里面有1000个特例;虽然同样是10%,后者结论所依据的数据总量在说服力上高出1000倍;结论的正确概率也高出许多。而对于希伯来语圣经中的许多语言现象,我们面对的是前者这种情况。依据这类确定性并不强的结论推导出的研究成果,其可信性是颇令人怀疑的。

天获得的能力和技巧。获得这个能力和技巧的社会环境所尊崇的宗教或者道德经典是这些语言的词汇和语意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对待这些经典的或好或恶的态度并不决定经典影响这套后天获得的语言的程度；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个社会是否关心这些经典；如果关心了，经典的作用就达到了。例如，霍金博士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的《时间简史》<sup>①</sup>仍然频繁涉及圣经中的概念，尤其是《创世记》中的许多概念。所以说，圣经这部经典在目前的国际社会中许多人群的语言语汇影响很大。

鉴于圣经这部文化经典对文化语言语汇的重要影响，作为中国学者，如果要和国际学术界交流，就不得不了解和尊重已经存在的对这个文化语汇进行研究的方法。只有对这些方法和运用它们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足够的了解之后，进一步的交流和拓展才能够进行。同时，我们在花费大量精力去了解西方现存的学术方法之际，也要敢于探讨其局限性。只有这样，我国对西方希伯来语圣经的研究才能够在集前人成果之大成的基础上，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从而更好地为中国自己的学术事业服务。

（责任编辑 陈会亮）

作者陈贻绎，美国康内尔大学近东研究和圣经研究博士（2000），专长希伯来语圣经研究、犹太文化研究、古代近东研究，现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近期代表作有《希伯来语圣经——来自文本和考古资料的信息》、“Understanding Israelite religion——New Challenges for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s,” *Religion Compass* 1, 50-60, 等。

---

① 史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时间简史(插图本)》.许明贤、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